

● 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 ●

李约瑟画传

LIYUESE HUAZHUAN

ONLY
WORK
cks of medieval China
M, WANG LING
SOLLA PRICE
John H. Combridge



王钱国忠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 ●

LIYUESE HUAZHUAN

李约瑟画传

王钱国忠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李约瑟画传

编者:王钱国忠
责任编辑:王光烈 姚必强
封面设计:张世申 张 昭
技术设计:张世申 张 昭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1
电 话:(0851)6828557(编辑部) (0851)6828390(发行部)
印 刷:贵阳经纬印刷厂
地 址:贵阳市新添寨新添大道 117 号
邮 编:550018
电 话:(0851)6845622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187 千字
印 张:6.75
印 数:1—5000
版 次:1999 年 1 月贵阳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855-X/C·60
定 价:13.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由厂家负责调换。

总 序

黄兴宗*

执笔撰写此总序时,深知有人比我更能胜任此重任,我正站在他的巨影之下而为之。假如李约瑟今天尚健在,他本人就会高兴地介绍由王国忠(即王钱国忠)及其合作者辛勤编辑翻译的书信、文章、照片和有关其他生活、工作的这套适时的“书系”。这套“书系”为中国的读者了解这位卓越的“20世纪复兴人^②”的品格与成就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对我说来,这件事使我再次回忆起1943年~1944年在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担任李约瑟的行政助理,与他一起度过的17个月,此情此景犹历历在目。他由伦敦皇家学会派往中国,对学术界与科学界为中国的生存反对日本侵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的中国同行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艰苦状况,立即感动了他。为了具体表示同情他们困苦处境并赞叹他们的机智,他创

* 黄兴宗博士系前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资源应用组主任。

② 莫里斯·戈德史密斯(Maurice Goldsmith):《20世纪复兴人——李约瑟》,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

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作为他力所能及的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一切物质帮助的一个办法^①。他想出一个巧妙的计划，让中国的院校向国外购买非常需要的化学药品和设备，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运来，用中国货币支付货款。我随他作了三次难忘的旅行，第一次经过蜀中的几个内河城镇，第二次去了遥远的西北敦煌，第三次是东南部的福州^②。

至1944年10月我赴英国时，他的夫人李大斐和另外几位科学家已来和他会合，科学馆的工作开展得很好。

李约瑟的种种努力使他倍受战时中国的最主要学者和科学家的喜爱。1946年3月李约瑟离渝返英，汪敬熙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对于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凄楚。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走。在困难时候，友人，“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③。在告别会上，傅斯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④

李约瑟给了中国很多，而他得到的回报甚至更多。事实上，中国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若无在华的经历，他的下半生未必全部献给了这个事业——（我们现在知道）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1943年我初次见到他时，他对我说，他打算战后花两年时间，撰写《中国科技史》。当时他为自己定下了这项工作。工作量究竟有多大，他心中无数。经向他会见的一些学者多次请教后，得悉不断增多的资料在中国古典文库内等待他，

^①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活动在本“书系”之《李约瑟游记》中有详细叙述。概述请见黄兴宗：《李约瑟与二次大战时的中国科学状况》，中国深圳第七届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会议录（1996年1月16日~20日）。

^② 我自己叙述这次经过在黄兴宗的《李约瑟博士1943年~1994年旅华随记》，李国家、张孟闻、曹天钦和胡道静主编的《中国科技史探索》第39页~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国际版。

^③ 《科学前哨》第284页。原文发表在1944年3月7日的《大公报》。

^④ 《科学前哨》第286页。

他才认识到，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两年“部分时间”难以完成一项这么重大的任务。正如我们说的，余下的便是历史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划，在他旅华期间已经酝酿，为此，后代将铭记李约瑟^①。李约瑟决不会忘记他在中国得到的鼓舞、帮助和建立的友谊。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说：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使我能够初步知道一些中国的科技文献，因为在每一所大学里以及不少实业机构里，都有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他们不仅能够而且都非常乐意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途径。”^②

然后他继续列出他曾与一些互相获益的学者姓名^③。为了对得自中国友人的慷慨帮助表示感谢，他谨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中他本人撰写的几卷献给在华相识的中国学者^④。

中国对李约瑟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那是很微妙的影响，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李约瑟的中国化。他的生活方式中有了某些中国习惯。例如，他初来中国时，人们总是称他尼达姆博士(Dr. Needham)，译成中文为“倪德汉”。时隔不久，他开始不满地说，这个名字的中国味不足。所以每有机会，他就提醒朋友说，他喜欢人家叫他“李约瑟”(Li Yue-Se)，从此全国皆知他就是李约瑟。他染上的另一个习惯是睡前和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穿着中国蓝布长衫。这个习惯，在他从中国回去后始终保持着。当他的旧长衫穿破时，幸亏有许多朋友乐意地不

① 那是在1943年他赴四川李庄访问时，初遇王铃。王铃后来成了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划的第一个合作者。

②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11页~13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

③ 他在中国的旅行还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获得有关中国科技和医学的经典著作。他在成都和福州的旧书铺里花了许多小时。他还收到了作为礼物送来的不少珍贵本的重要著作，诸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他特别感谢竺可桢博士馈赠的全套1726年版的《古今图书集成》。他自己购买的以及作为礼物收到的这些书籍构成了一个珍贵文库，成为现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主要馆藏。

④ 第一卷是谨献给鲁桂珍之父鲁仕国的。第二卷中他对三位剑桥学者表示感谢，他们曾指导他学习神学、哲学和汉语。余下的23个名字中，16个是中国朋友，4个是西方友人，全是他受派遣在中国时期相识的。那几位中国朋友代表了那一代最主要的科学家。他们中仅有的一位政治人物是周恩来。那是在周恩来作为延安政府正式代表在重庆工作时他认识的。

时帮助他购得绸长衫。他穿着这样的一件长衫，还叫人画了一幅作为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的正式画像。这是一幅挂在剑桥冈维尔—基兹学院食堂墙上、不穿英国典型服装的独一无二的画像。在他受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邀请去白金汉宫这个正式场合时，他在绸长衫外穿一件马褂。

李约瑟的中国化不是表面的。中国不止在一个方面改变了他。正如在数年后鲁桂珍所说：“也许是由于这些经历，所以他在中国呆了这些年月之后，我觉得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在1937年初见他时的样子。十年功夫里，他变得更老成、更耐心得多，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急急匆匆，也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常对我说，战时中国交通缓慢，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仿佛他一生第一次得以享受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伫立闲眺’的福份……。在这情况下，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不管总部辗转发来的电报，反正要复也没法复。

因此说，在中国的生活给他的影响，是使他心情安宁、平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艰苦工作的习惯，也不意味着失去了在需要的时候速战速决完成艰难任务的组织能力。只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所以他自号为‘十宿道人’是完全适当的。^①”

但是，尽管他有浓厚的道家倾向，他的一生仍是英国国教传统中的一个忠诚拥护者。我曾初次和李约瑟一起参加拉丁语大弥撒，那是1943年我们去中国西北时在甘肃汉中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的^②。80年代时，我偕内人每夏常去剑桥，每逢星期日，他就一定要我俩去撒克斯德(Thaxted)教堂参加圣餐礼，他在那里作为主持礼拜的俗人已有多年^③。甚至在他90高龄只能坐轮椅时，还按时请冈维尔—基兹学院学监约翰·斯特迪(John Sturdy)牧师来到他的房间，为他举行圣餐礼。要是适

① 鲁桂珍：《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33页～34页。

② 黄兴宗：《李约瑟博士1943年～1944年旅华随记》，同上书第51页。

③ 也可参看王铃在戈德史密斯书中的回忆(1945年)，第142页。李约瑟是撒克斯德教区牧师康拉德·诺埃尔(Conrad Noel)的好朋友，他是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逢斯特迪来访之际，我碰巧也在剑桥，他总是要请我和他一起参加。

还要特别一提的是：他后半生注意力纵然集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划上，而对他学术上的“初恋”——生物化学仍是藕断丝连。因为在大学里让他随便做什么，给了他绝对自由的同时，他如同生物化学教授威廉·邓恩·里德爵士(Sir William Dunn Reader)一样，有责任去完成某些法定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给学生上生物化学课。由于需要，他必须与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并进。当也许正埋头于“诸如15世纪初叶中国的造船的题目，却又不得不站起身来去讲酮病，或者软体动物的甾醇代谢作用”^①时，对他而言，想必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生活。不管怎样，不合意的工作显然没有使李约瑟放慢努力勾勒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轮廓^②。实际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可能有助于保持他体内的科学火焰不熄，直到他临死的几天。

李约瑟喜欢把自己当作“桥梁建造者”。他是位多产作家，出版的题材广泛，包括生物化学、形态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宗教史、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科技史^③。如果有一条贯穿他的全部著作线的话，那便是他不断探求“调和或联合分离的事物”。他可以声称在他探求的四个领域中已获得成功：作为形态学与生物化学的科学家；作为科学与宗教的哲学家；作为社会主义与社会责任的政活动家；尤其是作为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科学史史学家^④。他探求中的一个失败是基督教与道教之间的调和，即具有人格的神的温暖父性与无人格性的“道”的包含一切之间的调和。最后他承认，如果一定要叫他作出选

① 鲁桂珍：《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国科技史探索》第36页。

② 据各方面说，这段时间李约瑟在剑桥的讲课清楚、备课充分、有启发性。在他于1966年成为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之前，必须坚持这么做。

③ 他的著作目录(至1980年)，请参看《中国科技史探索》第701页~720页。也可参看戈德史密斯书中(1995)第159页~161页，1963年~1987年他在撒克斯德和其他教堂的布道。据我所知，这些从未发表过。

④ 李约瑟，见戈德史密斯书中的引述(1995年)，第16页。

择的话,他要选择具有人格性的而不是无人格性的^①。

他的许多关于中国科学史和有关题目的著作已经译成中文^②,可是关于他对人的经验迥然不同的调和所作的种种努力,有很多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材料,中国的读者仍求之不得。本“书系”的出版正是弥补这个不足的良好开端。我们应当感谢王国忠和他的同事们,使该“书系”的编辑成为现实。王先生完全能胜任这项事业。他是《李约瑟和中国》这部值得赞美的李约瑟传记的作者。他不辞辛劳从各种来源收集材料,包括中文的信函、电报和通告,都是西方学者先前未曾见过的。我确有先睹为快之念了。

1998年11月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
(李雪云 译)

^① 复弗兰克·麦克马纳期(Frank McManus)的信,1988年10月28日,在戈德史密斯书中引述(1995年),第124页。

^② 例如,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目 录

李约瑟传略	(1)
青少年时代	(15)
剑桥——科学家的摇篮	(21)
国际科学合作的先驱	(31)
“还给中国一个公道”	(57)
“人民友好使者”	(91)
中西文化史上的奇缘	(125)
彪炳史册的千秋功业	(143)
20 世纪的伟人	(163)
李约瑟生平学术大事年表	(183)
引用书刊一览	(200)
后记	(202)

Content

The Biographical Sketch of Joseph Needham

In His Youth

Cambridge – the Cradle of Scientists

The Pioneer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Return Justice to China

The Envoy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The Sepcial Hands – joining in Chinese and Westen History of Cul-
ture

The Achievements Shining through the Ages

The 20 Century's Great Man

The Chronicle of Joseph Needham's Academic Career

A List of Reference Books

Postscript

李约瑟传略

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是英国王室御前顾问(CH)、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李约瑟博士早年是一位生物化学家,30—40年代以其二部学术专著而创立了化学胚胎学这门新学科,举世震动;在援助中国抗战的艰苦岁月,他率先提出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及建立国际科学机构的设想,最终形成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在皈依中国古代文明之后,以毕生的心血撰写并出版有30多卷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使之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在宗教方面,他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肯定它在科学的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并将它与科学互相沟通;在人类物质文明史上,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力地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并将东西方两大文明联结起来,指出其向“世界大同”方向发展的总趋势;他对中国人民及其科学家满怀深情,时刻关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先后八次访华,为推进英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竭尽全力。可以看出,李约瑟的众多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位生物化学家、一位科学史学家的范围,而涉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广阔领域。70多年来,他在生物化学、国际科学合作、中国科学史、宗教与科学的沟通、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了解和融合以及增进英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受到举世一致的赞誉,人们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伊拉斯谟”。

李约瑟是有着丹麦血统的英国人，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伦敦南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洗礼名叫诺埃尔·约瑟夫·特伦斯·蒙哥马利·尼达姆，李约瑟是他后来赴华前取的汉名。李约瑟的父亲约瑟夫·尼达姆是位严肃认真的颇有声望的专家医生，并擅长麻醉，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母亲艾莉西亚·阿德莱德·蒙哥马利是一位贤慧端庄的天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在李约瑟出生前10年，老约瑟的家庭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当时伦敦白喉大流行，他的前妻及其十几岁的爱女竟在一天之内被夺去生命。李约瑟是他父亲再婚后所生的孩子。

由于父母间的性格不合，而导致家庭常常处于纷争之中，这对童年的李约瑟来说，是很痛苦的。为了在这种分歧中达到自己的平衡，他无意识地从父亲那儿学得了科学的头脑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从母亲那儿学得了宽大的胸襟和有谋划、有创造的精神。而为了使父母能友好相处，他使自己处在“架桥”的状态中，永远谋求把分裂的东西合并起来，这种调和，表现在他以后对待科学与宗教、生物化学与形态学、宗教与社会主义、东方与西方等等的诸多方面问题上。

李约瑟自幼十分聪慧，在8岁时就学会了骑马、和打字，14岁始随父亲参加外科手术，并学习驾驶火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4岁的李约瑟被送入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受桑德森校长的影响，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桑德森对李约瑟的一些谆谆教导：“思考问题要有广阔视野”、“如果你能找到焕发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对他的一生发生了深刻影响，而桑德森的朋友、著名作

家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和社会哲学又对李约瑟的学术道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昂德尔公学,李约瑟还第一次见到了他后来的上司、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爵士,并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李约瑟和他的亲密朋友都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对此采取了欢迎的态度。显而易见,李约瑟童年时阅读的威尔斯和肖伯纳的进步著作是他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也是他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科学与社会及科学史的思想源头。

二

1918年10月,在昂德尔公学全面受到良好训练的李约瑟,按照父亲的旨意,由其经商的叔父阿尔弗雷德资助,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学习医科,以便继承祖业,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医师。但不久在讲课引人入胜的霍普金斯爵士的启发下,李约瑟改习生物化学。

在大学期间,李约瑟一面大量阅读关于宗教、哲学及科学的书籍,积极参与学校的学术活动,一面热衷于宗教与社会活动。在他的读者书清单上有彼得·海林恩的《大主教威廉·劳德传记》、亨利·艾萨克森的《主教兰斯洛特·安得鲁斯传记》、法国作家皮埃尔·昂普的小说《轨道》以及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著作”——班扬的《天路历程》等等。在大学圣路加协会的晚会上,神学教授伯基特和波斯语教授布朗的“关于摩尼教和伊朗医学”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向李约瑟“展示了学问的伟大和思想史的史诗般的风采”,使他终生难忘。在宗教活动方面,他是圣三一公谊会会员,并担任剑桥大学圣路加协会剑桥分会秘书。他还是学校极高级的学术团体——套管俱乐部的成员。在此前后,他还参加了英国工党。青年时代的李约瑟这时已在宗

教、科学与政治这些相互对立的重大课题上尝试初步的沟通工作。

1922年夏,李约瑟从基兹学院毕业,并在剑桥良牧宣道会当了两年杂务修士。二年后,他获得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并与他的同学研究生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即李大斐)结婚。25岁时,李约瑟第一次主编了《科学、宗教与社会》一书,并撰写其中的重要部分,撰稿者多为当时著名的科学家与学者。在罗斯科夫海上生物实验站旅行期间,李约瑟有幸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产者进行交往,从而引导他去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1926年英国工人总罢工期间,初涉政治的李约瑟采取了调和折中的立场,在大东方铁路线上担任义务机车司机,后因铁路公司企图以“全国紧急状态法令”作借口欺压铁路工人,他才领导其他志愿者一齐退出。

李约瑟早年生物化学的成就是与霍普金斯爵士主持的生化实验室分不开的。霍氏对科学研究管理所持的道家式的“无为而治”的态度,使生化实验室成为“李约瑟的真正的家”、一个最自由、最民主的集体。在霍氏的热情支持下,李约瑟对胚胎发育期的化学变化作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这项历时10年的研究最终以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的出版而告捷。1931年出版的这部三卷本著作,为李约瑟在生化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它不但给一门崭新的学科下了定义,作出解释,为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后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前驱。10年之后,李约瑟的另一部专著《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大战中的1942年问世。该书试图把胚胎的发育与他当时称为的“形态发生激素”联系起来,同样获得一致称赞。有人评论说,它将在科学史上列为李约瑟的杰作而流传下去,必将成为达尔文以来生物学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名著。

李约瑟从少年时代就养成的对科学史的兴趣,由于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给李约瑟注入新的强大动力,特别是苏联代表团率队的布哈林及物理学家赫森等人的大会发言,又极大地加深了他的这种兴趣,并将他吸引到

马克思主义一边上来。与此同时,他还和剑桥年轻的左翼科学家一道,积极参加当时的反战运动,反法西斯主义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伴随物——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并积极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担任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的司库,以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国际纵队志愿军的家属。李约瑟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历史在我们一边》和《时间——更新的长河》等论著中,明显地反映了这方面的主张及活动,并对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很大的激励作用。1936年,他还受命以“单人委员会”的名义在剑桥创设科学史讲座,即今天剑桥大学著名的科学哲学史系的滥觞。

三

1937年,是李约瑟一生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这一年,剑桥来了三位中国留学生,他们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留学生给李约瑟带来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术传统,尤其是鲁桂珍更给他带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李约瑟说,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从此以后,李约瑟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就像《圣经》上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改过自新、皈依基督那样而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于是他在37岁之时,发愤学习汉语,向鲁桂珍和著名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学习,并不带功利目的,而作为一件有趣之事对待之。在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和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一番事,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那样。此时的李约瑟已立志要写“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

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即后来震动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胚芽。

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的重要时刻决定派遣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作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于是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被选中，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代表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前往中国。在考察了美国与印度的一些科学事务机构后，1943年3月，李约瑟从印度加尔各答抵达云南昆明，在昆明稍作访问后到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开始他在中国的长达4年的科学文化“长征”。李约瑟到中国不久，发现在人道主义方面没多少工作可做，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切实帮助那些在战时条件下坚持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则大有可为。于是他向英国政府建议成立一个以上述任务为己任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并得到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的积极支持。

1943年6月，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建立，李约瑟亲任馆长。从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及其合作馆成员仅依靠一辆2吨半的旧卡车，在日军非占领区进行4次长途考察旅行，行程达25,000公里，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100多篇中国科学论文至西方杂志发表，并结识了上千位中国科学家及学者。中国科学家称李约瑟是雪中送炭的朋友，确非过誉。

李约瑟在访问考察战时中国科学界的同时，还顺途考察了多处中国古代文化遗迹，领略中国文明的风采，并为写作中国科学发展史搜集丰富的资料。

于此同时，李约瑟一直在思考国际科学合作的宏伟事业，他筹划在战后按照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模式，在非工业化的国家建立实地科学合作馆，以帮助他们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并建立相应的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将“科学”这一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内容列入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之中。李约瑟为此撰